

制度設計、象徵表達、話語控制

——民國北京政府對「共和國慶日」的建構

• 郭 輝

摘要：民國北京政府通過制度設計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日制訂為國慶紀念日，利用各種歡慶紀念活動象徵和表達出「共和」意象，且媒體輿論在政治主流話語影響下，也側重於對「共和國慶日」的理解和詮釋，由此，北京政府完成對「共和國慶日」的建構，形成「共和國慶日」整體政治符號。不難理解「共和」作為北京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受到相當的關注和重視，並被北京政府利用各種措施和手段進行宣傳和建構。國慶紀念日原本為紀念武昌起義之日，被北京政府灌輸以共和精神，從而重構革命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其根本出發點是為樹立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和政治權威，以更好地維持政權統治。

關鍵詞：北京政府 共和國慶日 制度時間 象徵表達 話語建構

辛亥革命在歷史長河中被不斷闡釋與書寫，經歷一個意義不斷豐富的過程。現今人們心中的辛亥革命已遠非真實的辛亥革命，雖然史學研究者一直欲圖還原真實客觀的辛亥革命，但如此努力始終難見成效。

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國政權為袁世凱掌握，之後多年，民國北京政府掌控政權。有趣的是，武昌首義日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中，一直被當作國慶日來加以慶賀和紀念。武昌起義發動時袁世凱尚屬清廷大員，談不上對起義有何功勞，那北京政府出於何種目的將武昌首義日立為國慶日？對於孫中山「禪讓」的政權而言，如何紀念武昌起義「國慶日」？何以對「武昌起義」如此重視？

圍繞民國北京政府與國慶日之間的關係，學界已形成一定觀點。李學智曾詳細記述了北京政府時期國慶活動經歷由民初官民一體共同慶祝到後來官民分立與對立的變化過程^①。其中雖部分解決了「如何」紀念的問題，但未能回答北京政府舉辦紀念活動的目的何在。姜瑞學重視國慶儀式對民眾認同的塑造，認為

北京政府利用國慶紀念日動員民眾，以建構權威，鞏固統治，獲取民眾對中華民國的認同^②。此種解釋似乎接近對「目的」的探究，但對認同塑造形式的論述略顯單薄，而且僅靠儀式活動是否能達塑造認同之效，亦有深究的空間。

對於一個政權來說，最重要的是存在正當性與合法性。北京政府的正當性來源顯然非來自「革命」，袁世凱之所以能得到孫中山「禪讓」，其勸諫清帝退位功不可沒。清帝退位，「共和」取代「帝制」，所以北京政府必須將正當性來源建構為「共和」，以符合歷史事實。北京政府時期，「共和」成為流行詞彙，尤其在國慶日紀念時，更是言必稱「共和」。

就此而論，「共和國慶日」似為典型政治符號。陳恆明在《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一書中，詳盡分析若干民國政治符號的內涵、運作與功能，既有理論闡述，又有事例演繹，但對政治符號的建構，即政治符號如何被製作成形這一重要問題缺乏應有關注^③。本文將「共和國慶日」視作整體政治符號，從制度設計、象徵表達、話語控制三個層面考察北京政府對「共和國慶日」的建構，試圖更好地回答以上所提問題。

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建構需要各種途徑，而制度設計乃基本途徑之一。民國北京政府在「共和」建構中，選用一個「制度時間」——國慶日——宣傳和建構「共和」，通過在當時具有廣泛社會認同的「武昌起義」來建構對於政權具有重要意義的合法性來源。

一 制度設計：國慶日的生成

制度設計為意識形態建構提供重要基礎。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建構需要各種途徑，而制度設計乃基本途徑之一。制度保障能將意識形態融入制度之中，通過制度實踐讓意識形態落實到具體層面，從而讓意識形態成為人們生活的潛在思維方式。民國北京政府在「共和」建構中，通過設計一個固定時間或地點以宣傳「共和」，對此進行制度設計，選用一個「制度時間」(institutional time)——國慶日——宣傳和建構「共和」，通過在當時具有廣泛社會認同的「武昌起義」來建構對於政權具有重要意義的合法性來源。這裏所謂的「制度時間」，是指特定組織或機構成員共同遵守的時間制度^④。

中華民國剛成立不久，即有人提出要建立民國「制度時間」——紀念日，希望每年都能紀念一些重要的日子。制度設計的提出始於此時，此前中國並不存在紀念日設置的問題。在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有代表提出國家紀念日設置問題。可能是由於民國乃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國」的緣故，處處講求與西方接軌，在紀念日設置上亦不例外。但具體到以何日作為國家紀念日，各省間存有分歧。如邵章建議以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日為紀念日，其理由是此日「關係於全國觀念之一日」；黃炎培卻稱「立國紀念最為重要，南北尚未統一時，南京已有政府，約法已經頒布，總統已經推舉，參議院亦已成立，所以這次北洋政府的成立實是奠於南京」^⑤。當時還有人提出以黃花崗起義、「安徽徐錫麟、熊成基慘死」、「吳樾死事之日」、「四川龍川獨立日」等作為紀念日^⑥。最後參議院通過黃炎培的建議，以陰曆八月十九日為武昌起義革命紀念日，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南北統一紀念日，陽曆1月1日為立國紀念日^⑦。然而，在沒有法律效力的臨時機構上通過「制度時間」的設定，只能作為給政府的參考意

見，不具強制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制訂的國家紀念日，最重要者應是黃氏所稱「立國紀念日」，而未突出武昌起義「革命紀念日」；從紀念日名稱而言，此時恰恰強調武昌起義「革命」的一面。

1912年官方緣於黎元洪對政府的請求，開始關注紀念日設定。在武昌起義周年紀念即陰曆八月十九日將要來臨之際，黎元洪電袁世凱，請求政府派員參加即將在武昌舉行的武昌起義周年紀念。黎元洪所提及的武昌起義周年紀念，顯然指武昌或湖北舉行的紀念，應屬地方性活動。9月12日參議院討論黎元洪請求時，谷鍾秀稱武昌起義紀念應「天下共之，八月十九日並非武昌一地之紀念日，各省皆應開會，何必定在武昌」；劉崇佑亦云：「紀念日宜天下共之，但武昌係紀念地，似應派人前往。」^⑧參議院對此事相當重視，甚至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紀念，並決定派員前往參加武昌活動^⑨，但此時僅為參加陰曆八月十九日的紀念活動，未形成固定制度，尚屬臨時決定。

北京政府時刻關注事情發展，9月20日國務院擬定〈國慶日及紀念日案〉，呈請袁世凱諮詢參議院。此案所設置三個紀念日與此前全國臨時教育會議所通過建議完全相同，顯然非國務院憑空想像，而是在「集思廣益」下提出，稱「據法國成例，以武昌起義日去年陰曆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為國慶日。是日應舉行事：(一)放假休息；(二)懸旗結彩；(三)大閱操；(四)追祭；(五)賞功；(六)停刑；(七)恤貧；(八)宴會。以南京政府成立日即正月一日，又北京宣布共和日即二月十二日為紀念日，是日均放假休息」^⑩。前面已論及，對紀念日設定乃遵照西方模式，具體參照例子為法國。吳稚暉主張依法美之前例，他指出紀念日設定宜採用陽曆，且極力贊同參議院將中華民國革命紀念日「定為每年陽曆十月十日」的提議^⑪。紀念日設定參考法美，與法美國家性質皆為共和政體有莫大關係，因中華民國也以新型「民主共和國」宣稱於世，故北京政府與國民黨人容易達成共識。法美兩國在國慶日設定上皆以「革命」為內容，相當於中華民國的武昌起義，當時將武昌起義紀念日作為國慶日的呼聲日盛。

參議院很快通過〈國慶日及紀念日案〉^⑫。袁世凱不久後也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公布此案，決定以10月10日為國慶日，1月1日與2月12日為紀念日，分別紀念南京政府成立和北京宣布共和^⑬。此案正式確定國慶日作為制度時間，尤其突出國慶日地位，以區別於另外兩個紀念日，為即將到來的武昌起義紀念打下制度性基礎。制度時間的確定為建構「共和國慶日」之第一步，沒有國慶日一切無由談起，國慶日為宣傳共和的載體，將共和與國慶日捆綁一起為北京政府確定制度時間的最鮮明策略。北京政府於國慶日十分注重宣傳共和。如周年國慶紀念之時，北京政府發表宣言書稱「溯自共和肇基，政府之嶄新政策由此發生，更無帝制自為者」，整篇宣言立意共和^⑭。北京政府更於國慶二周年紀念之際，稱民國為「共和之國度」^⑮。可見北京政府塑造「共和國慶日」的良苦用心。

還值得一提的是，此時北京政府所設置的紀念日皆為慶賀性質，可見其對紀念日文化的取態——意圖製造歡慶中華的氛圍，以此炫耀政績，鞏固統治，獲取統治合法性。那民眾對北京政府所設定的國慶日到底有多大認同程度？在周年紀念前後，《大公報》連載兩文，就「國慶之期」提出質疑：「去年陰曆八月

制度時間的確定為建構「共和國慶日」之第一步，國慶日為宣傳共和的載體，將共和與國慶日捆綁一起為北京政府確定制度時間的最鮮明策略。政府並不考慮所謂紀念時序問題，而是著重於如何在國慶日貫徹「共和」宣傳。

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號，為民國之去年否，抑舊清宣統三年之去年耶，為舊清宣統三年之去年，則無論陰曆之八月十九日，陽曆之十月十號，理應屬之舊清宣統之三年，非中華民國之元年，所得追算而有之也，不追算而有之也，則今年十月十號所紀念之慶辰，應屬舊清之去年，而不得為民國之去年，故所謂國慶者為慶舊清乎，慶民國乎，慶舊清之推讓乎，告終乎，慶民國之肇生乎，建立乎」，甚至抱怨武昌起義暨國慶周年紀念為「抓其名而棄其實」^⑩。顯見民眾對國慶日認同有限，但不能否認這種制度時間的確定為北京政府統治提供便利。政府並不考慮所謂紀念時序問題，而是着重於如何在國慶日貫徹「共和」宣傳。

二 象徵表達：國慶日歡慶紀念活動的操辦

北京政府利用民眾對共和記憶最為深刻的一面，構建對共和更為淺顯的聯繫。國慶之意義被北京政府構建為「共和」紀念慶典，國民在國慶日舉行慶祝亦被冠以「熱愛共和之國民」對於「共和之熱忱」。

「象徵」指某個觀念或事物的代表。象徵要求「形象」能很好地「體現事物本體的實質，並且足以暗示出它所具有的意義」^⑪。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在論述象徵時說：象徵一方面是一種在外表形狀上看可暗示某種思想內容的符號，另一方面它又能暗示普遍性的意義^⑫。不管怎樣，象徵涉及兩個事物，一個要能更好表達另一個的意思。

象徵表達為意識形態提供鮮活的表現方式。意識形態原本抽象，如何使人們在生活或日常工作中接受官方宣傳的意識形態，對政府本身即一項重要而艱鉅的任務，宣傳好壞直接關係人們對政府、政權的認同程度。而大多數政權操控者在意識形態宣傳方式上，愈是直接化、表面化，愈難收到成效。例如，愈是對民眾直接宣講共和為何，不但效果不佳，反易引起民眾反感。在策略上尋求象徵表達就顯得尤為重要，讓宣講的意識形態與象徵物結合，而此象徵物又要為普遍大眾喜歡，樂於接受，如此不難達到較佳效果。不過意識形態與象徵物的關係必須加以建構，從而形成習慣性聯想認識。

「共和」於民眾記憶顯得十分抽象，但民眾普遍皆知民國確立「共和」政體。雖然不知共和為何物，但知共和是好東西。這觀念放置到象徵表達中即足以讓北京政府利用民眾對共和記憶最為深刻的一面，構建對共和更為淺顯的聯繫，是為國慶日「慶」的誕生。當時就有人對國慶日的「慶」有如此看法，稱國慶日之「慶」即慶共和，為能體會「共和之真精神」，享受「共和之真幸福」^⑬。就此論之，國慶之意義被北京政府構建為「共和」紀念慶典，國民在國慶日舉行慶祝亦被冠以「熱愛共和之國民」對於「共和之熱忱」^⑭。在兩者聯繫的建構上，北京政府已獲得成功。

國慶日「共和」之「慶」最為直觀的體現是「懸燈結彩」。「懸燈結彩」之「結彩」即搭建臨時牌樓，配以松柏、鮮花、電燈等。松葉柏子被時人寓以「松柏長青，慶祝共和萬歲」^⑮之意。1912年國慶日，北京各處懸燈結彩，搭建彩牌坊，營造慶典氛圍。在北京琉璃廠東西兩門各結松牌坊一座，覆以結彩，樓頂中嵌攢花五色匾，匾中書「萬邦協和」、「普天同慶」等字。四周嵌以電燈廠甸，會場東首門口及西首門口分置結松結彩牌坊各一座，均以會名「共和紀念會」為匾號。門

內設中央蓆樓一座，命名「黃鶴樓」，以取武昌起義紀念之意。樓中為演說處，以琉璃窗為入門，進會場照壁上掛置彩燈多盞，出外門至場內左右均以長繩串掛紅燈。運動場中置彩結高門一座，名為「德勝門」，四周約有十餘丈。南同門前有結彩牌坊一座，上嵌彩花「國慶」兩字²²。而京城居民店鋪均休業慶祝，五色旗幟，處處飛揚。

如前所述，「懸旗結彩」本為政府規定國慶日應舉行之事。1913年國慶日北京太和殿會場，以及「各機關、各社會、各學校、各街市，揚五色之國旗，騰萬家之燈彩，輝煌燦爛，藉以點綴昇平，即外而各省，亦相與接踵事增華，同聲遙祝，較之上年國慶日之景象，不可以同日語」²³，景象較周年有過之；1917年國慶，因人事天災，「結彩」不如1916年之盛，只「總統府前圍牆較去年多一重燈彩，此外似多減色去年」。公園門前未搭彩樓，前門外只箭樓牆上以草花結「國利民福」四字，略綴點燈而已²⁴；1922年國慶日的北京，車站所繫電燈彩坊、員警廳前大彩坊、天安門前五孔最大彩坊、新華門前彩坊，均較往年精美。且東西兩轅門結彩坊滿布車燈，中央公園門首如往年均結彩坊，東城自崇文門至金魚胡口馬路兩旁懸掛紅燈。還有其他各街口、重要機關門首都懸有國旗，設有彩坊，全城點綴如畫²⁵。

此外，彩坊上可以綴以文字，此常被用來表達共和與國慶紀念。如1916年南京雙十節慶祝，軍署大花廳及參謀廳副官處等大門彩坊上裝「民國萬歲」四字，省公署大門樓上以五色電燈裝配「普天同慶」四字²⁶。1922年北京國慶紀念期間，西車站電燈彩坊結「五族共和」四字，前門外珠市口彩坊綴以「共和萬歲」四字，內務部街口與外珠市口彩坊綴以「共和紀念」四字²⁷。

通過設計，「共和」抽象話語具體化、形象化，原本無法言繪的意識形態得到更好表達，民眾於絢爛燈彩中享受感官刺激，同時受到潛移默化影響。活動參與者能處處體會到共和話語，使共和話語穿透力大大增強，便於人們形成對「共和」的深刻印象，接受「共和」，從而認同國慶日「共和」意象。

在國慶紀念期間，除懸旗、懸燈結彩外，政府還會舉行賞勳、閱兵、宴會等，這些活動基本上每年都會舉行，不過民眾參與有限，多為政府與官員的慶賀活動，某種程度上也僅是形式。另外，國慶日還會舉行眾多民眾參與的活動，在政府推動下民眾享受歡慶之娛，達到與民同慶、與民同樂之效力。這些活動包括：

一、設陳列館，辦各類運動會、演講會等。1912年北京國慶周年紀念期間，設陳列館供人參觀，展出革命死事諸烈士寫真及革命戰事攝影約千餘枚，中陳玻璃匣內有革命印信、文札、刀矛槍械，烈士遺物如假髮辮及衣帽，更有某女士輸送北京之炸彈特製背心、汪精衛等在監禁時所繫鐵鏈鐐銬，以及王天縱起義時的旗幟等物品²⁸。1916年杭州國慶紀念期間，10月9日至11日由省公署選擇尚未發還至賽品主人手中的巴拿馬博覽會各賽品，在湖濱路房屋內陳列，以資比賽。又女子職業學校發起聯合省會，各女校組織陳列室，在會場左近房屋內舉行女校成績展覽會。南海貧兒教養院諸生在慶祝會場設壇舉行技擊。杭州通俗教育講演傳習所畢業員組織通俗教育講演會，輪流講演，遊人得明慶祝

國慶日「共和」之「慶」最為直觀的體現是「懸燈結彩」。通過設計，「共和」抽象話語具體化、形象化，民眾於絢爛燈彩中處處體會到共和話語，使共和話語穿透力大大增強，便於人們形成對「共和」的深刻印象，接受「共和」，從而認同國慶日「共和」意象。

人們在國慶日舉行的大量慶典活動中感受歡慶愉悅，形成共和認同。政府利用紀念活動動員民眾廣泛參與，凸顯人們的喜慶祥和，國家的安定團結。舉國歡慶、與民同樂的盛世氣氛被用來紀念共和締造，北京政府將國慶日「共和」意象演繹得淋漓盡致。

本旨。青年會舉行衛生展覽會、幻燈講演會、室內運動會、室外運動會等²⁹。1922年直隸國慶紀念期間，教育廳設各校成績品陳列室，於下午開放，任人遊覽。青年會則於下午4點在東馬路大禮堂請梁啟超講演，題為「市民運動之意義及其價值」。學生同志會假廣東會館東西北三處宣講所講演³⁰。此類活動能調動民眾積極性，通過展出革命物品和演講，灌輸參與者各種理念與思想。

二、舉辦提燈會、演戲等娛樂活動。1912年國慶周年紀念時，南京各軍隊於10月9日至11日夜間舉行提燈會，普通燈用五色國旗製成，或書革命周年紀念，或書光復紀念，或書鐵血立國周年紀念；特別燈則用獅燈取中國如睡獅猛酣意，其餘各種花燈名目不一，光怪陸離³¹。1916年國慶日，北京教育部模範宣講所舉行特別演講會及演戲活動，布置極謹嚴³²；杭州新市場舉行雙十節典禮，會場備有影戲灘簧，夜間有提燈會。另有南海貧兒教養院諸生西樂隊、浙江陸軍第一師軍樂隊，以及劇界品曲社改良、灘簧改良等種種籌備³³。1917年國慶日，北京中央公園熱鬧異常，該園與宮殿開放，遊人甚眾。公園大加點綴，水榭有蘇州灘簧，春明館前有京師警廳習藝所音樂隊，更有露天影戲、焰火³⁴；而南京雖因戒嚴期內禁止各學校舉行提燈會，但各學校慶祝活動改在白晝進行，學生手執五色國旗，整隊遊行街市，非常熱鬧。各商號均懸燈結彩³⁵。1926年國慶紀念日，天津以娛樂活動為主，各戲園影院、雜耍館下午均擁擠不堪³⁶。從各地所見，各種娛樂活動在國慶日應有盡有，盡顯國慶本質。

三、舉行升旗禮、宣誓禮等。1912年廣州國慶周年紀念日，兵士學生萬餘聚集校場行升旗禮，向五色國旗行禮致敬³⁷。1924年上海國慶紀念日，閘北保衛團行升旗禮，程序如下：(1)授旗式，請總監督授予，由總董團董承受全團立正敬禮；(2)奏軍樂；(3)迎團旗；(4)奏軍樂；(5)升國旗，行禮，同迎團旗；(6)奏國樂；(7)演說；(8)出隊。南市保衛團則行宣誓式，先行軍隊檢閱，執事皆參與，以誌成立，並攝影留紀念。童子軍亦行禮，徐家匯南洋大學附屬小學童子軍，於晨8時在該校大操場召集全體隊員，舉行慶祝國慶典禮，程序包括：(1)號召；(2)整隊；(3)升國旗；(4)唱國歌；(5)歡呼；(6)校閱；(7)訓詞；(8)名人演說；(9)操演；(10)茶點散會³⁸。

四、政府開放禁地，允人參觀。1914年國慶紀念日，總統在北京天安門閱兵後即任人民入內參觀，當日社稷壇亦開放，惟須費小洋一角購票，致貧寒者多不能入內遊覽³⁹。1916年國慶日，天壇農事試驗場等處開放，古物陳列所減價供人參觀⁴⁰。1922年國慶紀念，政府將三海開放三日，為「國慶日之遊園會，而表與眾同樂，共相慶賀之意」，並規定參觀對象：第一日為軍政界及議員並各員眷屬等；第二日為教育界及男女學生等；第三日為商界及平民等。同時自10月10日起開放先農壇三日，任人遊覽⁴¹。

如此多姿多采的歡慶紀念活動淺顯地表達「共和」，明確表達共和勝利所帶來的快樂、進步意象，人們在歡樂同時，也在慶祝共和制度在中國的勝利。人們在國慶日舉行的大量慶典活動中感受歡慶愉悅，形成共和認同。政府利用紀念活動動員民眾，讓民眾廣泛參與，凸顯人們的喜慶祥和，國家的安定團結。舉國歡慶、與民同樂的盛世氣氛被用來紀念共和締造，北京政府將國慶日「共和」意象演繹得淋漓盡致。

三 話語控制：「共和國慶日」建構的完成

話語背後隱含着權力。廣而言之，任何話語背後都包含權力參與，包括自命為客觀報導的媒體。報導者通過語言選擇，將主觀意識形態滲透到話語中，從而達到控制讀者的作用。具有強大勢力的政治力量更不例外，最容易成為話語控制者，通過強大政治干預及壓力，對各方造成影響，從而有效地將自己的政治意圖表露於話語中。但這種過於明顯的話語霸權不一定能收獲成效，反可能導致話語對抗。欲知話語控制的實際效果，話語合作控制者（媒體輿論）為應關注重點，同時需觀察話語到底想控制誰，而被控制者對此話語的認同度如何。

北京政府時期輿論環境相對寬鬆，較為自由，媒體觀察可說具有較大可信度，因在大量報導中不無對政局的觀察和批評。不過輿論環境自由不一定就意味着輿論不受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的影響。在北京政府時期，至少就輿論報導選擇性而言，就不可忽視意識形態的力量。當時，共和話語顯然被政府控制用來為政治目的服務，而「共和國慶日」的話語建構是這一過程的一環。通過分析當時媒體在國慶日的言論，便可知官方意識形態影響至深。

1912年周年國慶日，媒體充斥着各種國慶活動報導，盛況為民國少見。到1913年國慶紀念日，為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日，所謂「雙喜臨門」，慶祝活動實為不少。時人稱是日「普天同慶，率土臚歡」，一為國家慶賀，二為個人慶賀，還為民國全體人民慶賀，對人民之賀即「賀人民從此得享共和之幸福」^④。於此，國慶之慶賀即對「人民從此得享共和之幸福」的慶賀。

不過，到1914年國慶三周年紀念之際，因此時北京政府剛鎮壓「二次革命」不久，有輿論對共和顯露出擔心，於「共和國慶日」有了另一番描述，如稱民國於今三年，「迭經變亂，幸就救平，然而災侵時聞，伏莽遍地，內憂則到處堪憂，強鄰狡啟，邊境侵凌，外患則益形危迫」，那何以舉行國慶典禮？「不過藉此紀念之辰，表示日月不居，光陰可惜，策我全國上下之努力進行，以蘄達三年來渴望之真正共和盛軌而已」^⑤，可見輿論對政府所標榜的共和實際上已呈失望態度，而希望真正共和的到來。

1915年的國慶紀念，更是不同往年，袁世凱稱帝呼之欲出，政局不容樂觀，共和前景一片暗淡。這一年國慶日，軍人因「國體將改，不願慶賀共和成立之日」^⑥，未能舉行歷年皆進行的國慶閱兵。時論則表示惋惜，稱「去年今日，舉行國慶典禮之時，異常熱鬧，儼然普天同慶，今年今日，雖亦照常舉備，應有盡有，然聞大總統已命停止觀賀及閱兵，因此燈光旗影之中，遂俱含有興致闌珊之氣象」。不僅如此，人們甚至擔憂共和民國，謂「今日之慶，慶共和民國之產出也，今共和民國勢已垂危，且不免為國殤，將弔不暇，何慶之有」，「明年今日，恐雖欲求此興致闌珊之國慶日，而亦不可得矣」；並埋怨國慶日「雙十節」稱謂，稱其為「極不祥之讖語」，共和民國只「當有二十年之命運」，而今「不變為雙雙節乎」^⑦。其中已含對共和毀滅之嘆息，國慶之慶共和民國終會慶無可慶，進而國慶日之存亡危在旦夕。國人哀嘆「民國共和四字之命運，終不敵新帝國新

1915年，袁世凱稱帝呼之欲出，共和前景一片暗淡。這一年國慶日盡顯人們對共和之哀傷與紀念以及對共和將日落西山的擔憂。直至洪憲帝制覆滅，人們對共和重燃希望，「共和復活」、「共和恢復」、「共和再造」成為1916年國慶的主流話語。

不管國慶日輿論具體內容如何，也不管共和是否真正存在，無可否認政府作為話語控制者，而媒體輿論充當合作控制者，雙方各得其所。此表示「共和國慶日」建構完成，因當時輿論界在國慶日異常關注共和。國人圍繞「共和」不斷闡釋。

皇帝之天威，新皇帝一旦御極，新帝國萬無以民國國慶日為國慶之理，緣十月十日為成立民國之日也，故謂之民國國慶，今民國國慶日，惟此第四周十月十日之一日，此一日以後是去是留，尚在未卜，而「存留則在十之一，辭去則在十之九」^④。四周年國慶一方面盡顯人們對共和之哀傷與紀念，另一方面流露出人們對共和將日落西山的擔憂。

1916年國慶五周年紀念，因洪憲帝制覆滅，人們對共和重新燃起希望，對共和歡欣鼓舞，「共和復活」、「共和恢復」、「共和再造」成為當年國慶的主流話語。各地慶祝多以共和為題，正是「共和恢復，舉國騰歡，而締造艱難之國慶紀念日，亦因之以復活，此屆舉行典禮，各省無不竭力籌備，可徵國民傾向共和之熱忱也」。無錫國慶紀念，各商店「一律懸燈高揚國旗，慶祝共和」，學界亦「同伸慶祝，共和復活」；吉林國慶被稱為「普天共和國慶紀念」，今「共和復蘇，紀念期邇，吉省各團體領袖，刻正合謀籌備，多數主張，本年國慶屆期，點綴美滿，藉以表示吉人傾向共和之心理」^⑤；南京稱「今此共和再建軍警學商各界，皆興高采烈，先期籌備一切」^⑥；嘉興紀念慶祝會上有人演講曰：「去年今日帝制萌芽，國慶將消滅於無形，今歲今日，共和再造，日月重光，吾輩宜如何歡欣鼓舞，以慶祝此紀念耶。」^⑦如此言論不勝枚舉。

時論多強調武昌起義之於共和的意義及國慶紀念五周年之期共和恢復，稱武昌起義日乃「共和發軔專制代謝之第一日」，對「辛亥締造共和之成績，常懸國人心目之間，徵諸東西各國，靡不視為至重極要之舉」。而「洪憲君臣，直以此為末次之共和紀念日，不過未便先行廢除，故稍稍點綴，以敷衍國民之耳目而已」，直至「洪憲自斃，共和復活，今日仍得鬧鬧熱熱，慶賀共和紀念令節，實我民失而復得之大幸也」。所以今大總統宜「與內閣諸賢，舉共和立憲之真精神，發揚而光大之，以冀無負辛亥今日之悲壯，則人民年年今日，既為國家慶，又將為黎大總統晉無疆之頌也」^⑧。

另有論者稱，1916年國慶與「前數周大不相同」，謂「前數周內雖陽以十月十日為國慶，而其心中所慶者，絕不在是，故未幾而有洪憲紀元之一現，洪憲紀元既現，則是共和之國慶日，已被其無形取消，今彼已長逝，而十月十日又臨，吾民渴望之共和，又已復活，稱觴舉慶」，此復活「共和」為「四萬萬人之共和，四萬萬人中，有一人向隅，即失共和之真諦，又安有共和之可慶，今之以是日為可慶者，固曰四萬萬人共和也，夫既有共和之名，而終無共和之實，又豈共和國所應然，現在內雖無野心之總統，外雖無不法之匪徒，而大局情形，尚覺飄搖未定，今日雖舉行慶祝，固未可謂已治已安也，今我四萬萬人不欲保存共和則已，如欲真心保存此艱難締造之共和，則允宜各秉天良，屏除私見，庶乎共和大局可以鞏固，以云可慶，誠可慶矣，否則四萬萬人共和之實既失，又詎有共和可慶之足云」^⑨。論者力圖揭示國慶紀念真諦在「共和」，而「共和」真諦為「四萬萬人共和」，只有如此共和才可慶。

此後國慶紀念日輿論同樣看重共和，不過因政局動蕩，如1916年那樣對共和的期望情緒再也很少出現，多是哀嘆之詞和不痛不癢的共和說明。1918年國慶日，時論稱「今日之國是，比往年益騷亂，今日之政局，比往年益困難，改建

共和，於今七稔，而內憂外侮，迭起環生，回首當年，竟有江湖日下之概，此固辛亥起義，時所萬不及料者也」⁶⁰，言中之意乃共和肇建，但國是未能有所改變，共和徒有虛名。

然而，依然有不少言論強調國慶之慶乃為共和，而國慶日即共和紀念日。1920年國慶日，有人回答「何謂國慶」：「為國家慶也，為國民慶也，非僅為官吏慶也，為九年前之今日革除君主專制易為民主共和而慶也，非為自辛亥此日以迄今年今日，推翻君主專制易以武人專制而慶也」⁶¹。國慶為「共和創建之紀念」，而1922年國慶「為共和滿十年大紀念」⁶²。不過，此等言論似乎並非着眼讚賞共和，而是反思共和未能實現。

反思與澄清正反映出共和不再。1922年國慶紀念日有文章稱：武昌起義，共和肇始，原以為「我國其庶幾由是以興乎，詎料共和初建之開宗明義，殺伐而已，聚斂而已」。革命先烈「冒鋒鏑，薄血肉，擲無數頭顱以得來之共和，竟被少數惡魔所假借，舉全國人民土地，供其一己之犧牲，使先烈有知，亦未必能冥冥地下也，值茲共和紀念之日，正吾人追念往事之時，試溯十一年來之往事，無非傷心史而已」⁶³。那共和是否真的如此讓人失望與傷心？1923年有人撰文道：「共和成立之日，我們既為共和國民，雖未享共和幸福，但非共和政體之不善，實因改革十二年來，軍閥專權，武人禍國，不能達到真正共和目的。」對曹錕賄選，「智識階級份子，當然竭力奮鬥，誓死不能承認，推翻軍閥，使共和實現，方達目的。」而共和實如當時傳單所誌：「選賢與能，天下為公，共和真諦，中外所同，中華革命，政體變遷，共和開幕，大法昭然。」⁶⁴可見此時國慶紀念益加注重反思共和。

不管國慶日輿論具體內容如何，也不管共和是否真正存在，無可否認政府作為話語控制者，而媒體輿論在此充當合作控制者，雙方各得其所。此表示「共和國慶日」建構完成，因當時輿論界在國慶日異常關注共和。國人圍繞「共和」不斷闡釋，因時局變化，或努力探尋共和真義，或痛惜共和行將日落西山，或深刻反思共和。但毋庸置疑，不管國人對共和是失望抑或期望，都可見政府建構「共和國慶日」之效。北京政府紀念國慶日，開展歡慶紀念活動，通過積極引



1920年的一篇文章強調國慶之慶乃為共和，反思共和未能實現。

北京政府通過制度設計（國慶日）、象徵表達（各種歡慶紀念活動）、話語控制（媒體輿論）完成對「共和國慶日」的建構，根本出發點是試圖樹立自身統治合法性。共和是北京政府統治合法性的來源。

導，讓國人形成國慶日言說「共和」習慣，建構起「共和」話語體系，對國人形成影響。國人將共和與國慶日緊密聯繫，才會在國慶紀念之際關心共和，不斷敘說共和，而共和話語在國慶日的輿論中佔據着主流地位。

四 餘論

政治符號一旦建構完成，其功能即作用於權力過程，幫助建立、轉移、維持權力實踐^⑥。顯然，政治符號與政治權力緊密聯繫，北京政府通過制度設計（國慶日）、象徵表達（各種歡慶紀念活動）、話語控制（媒體輿論）完成對「共和國慶日」的建構，根本出發點是試圖樹立自身統治合法性。共和是北京政府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作為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主導下不僅從制度，還透過實際行動，乃至話語方面對民眾進行規範。民眾在政治「國家」中，可以說不得受其規訓，此或許是時代民眾的局限所致。但作為「國家」統治下的人，誰又不是如此？時人回憶所經歷的四屆雙十節，記憶最深刻且深受影響的是聽戲、觀禮、遊中央公園、看馬戲等^⑦，此皆慶賀活動，可見民眾記憶傾向於歡慶；從心理學而言，人對痛苦的事情會選擇性失憶。北京政府對「共和國慶日」之「慶」的強調符合人的欲望與本性，部分揭示「共和國慶日」建構有效的原因。

北京政府利用原本紀念武昌起義之國慶日軀殼，灌輸共和精神，重構革命歷史傳統，此政治文化策略實際上並未遭受國民黨反對。如孫中山、黃興於國慶周年紀念就將「革命紀念會」改稱「共和紀念會」，以籌備國慶活動^⑧。可見不管北京政府還是國民黨人都試圖打「共和」牌，「共和國慶日」作為重要政治符號為多數人們所認同。後世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實際上北京政府於辛亥革命後對共和的建構、宣傳才真正將民主共和觀念輸入人心，「共和」是「革命」所結果實，但需成熟期。

北京政府利用原本紀念武昌起義之國慶日軀殼，灌輸共和精神，重構革命歷史傳統，此政治文化策略實際上並未遭受國民黨反對。可見不管北京政府還是國民黨人都試圖打「共和」牌，「共和國慶日」作為重要政治符號為多數人們所認同。

註釋

① 李學智：〈政治節日與節日政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63-75。

② 姜瑞學：〈北洋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民塑造——以「雙十節」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頁216-18、241。

③ 陳恆明：《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④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224。

⑤⑦ 〈臨時教育會紀事 十三日談話會〉，《民立報》，1912年7月21日；〈臨時教育會紀事〉，《民立報》，1912年7月23日。

⑥⑫ 〈二十四日參議院會議記〉，《民立報》，1912年9月30日。

⑧ 〈十二日參議院會議記〉，《民立報》，1912年9月18日。

⑨ 〈十九日參議院會議記〉，《民立報》，1912年9月25日。

⑩ 〈專電〉，《民立報》，1912年9月22日。

- ① 吳稚暉：〈答客問革命紀念日應有之盛況〉，《民立報》，1912年9月22日。
- ② 總統命令，《民立報》，1912年9月30日。
- ③ 國慶文字補錄，《民立報》，1912年10月18日。
- ④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台北：文星書店，1962），頁69。
- ⑤ 中華民國之元年開民國周年紀念會議，《大公報》，1912年10月9日；〈中華民國之元年開民國周年紀念會議（續）〉，《大公報》，1912年10月11日。
- ⑥ 王冬青：〈紀念性景觀的象徵表達手法探析〉，《裝飾》，2005年第11期，頁117。
- ⑦ 參見黑格爾（Georg W. F. Hegel）著，朱光潛譯：《美學》，卷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頁11。
- ⑧ 閒評一，《大公報》，1912年10月11日。
- ⑨ 國慶日，《民立報》，1912年9月25日。
- ⑩⑪ 寧垣紀念會誌盛，《申報》，1912年10月12日。
- ⑫⑬ 北京國慶紀念會紀盛，《大公報》，1912年10月12日。
- ⑭⑮ 夢幻：〈閒評一〉，《大公報》，1913年10月10日。
- ⑯⑰ 國慶日聞見種種，《大公報》，1917年10月12日。
- ⑱ 雙十節北京全市之點綴，《大公報》，1922年10月12日。
- ⑲ 寧垣慶祝雙十節情形，《大公報》，1916年10月10日。
- ⑳ 雙十節北京全市之點綴，《大公報》，1922年10月22日。
- ㉑㉒ 杭垣舉行國慶典禮之秩序，《申報》，1916年10月10日。
- ㉓ 雙十節各界慶祝之情形，《大公報》，1922年10月10日。
- ㉔㉕ 北京電，《申報》，1916年10月10日。
- ㉖ 國慶紀念之南京，《申報》，1917年10月12日。
- ㉗ 雙十節見聞種種，《大公報》，1926年10月12日。
- ㉘ 廣州電，《申報》，1912年10月12日。
- ㉙ 今日之國慶聲中面面觀，《申報》，本埠增刊，1924年10月10日。
- ㉚ 國慶日盛況之種種，《大公報》，1914年10月13日。
- ㉛ 國慶日之遊園大會，《大公報》，1922年10月12日。
- ㉜ 對於國慶日之感想，《大公報》，1914年10月10日。
- ㉝ 今年國慶日情景，《大公報》，1915年10月10日。
- ㉞ 無妄：〈閒評一〉，《大公報》，1915年10月10日。
- ㉟ 國慶日中思國慶，《大公報》，1915年10月10日。
- ㊱ 普天同慶之雙十節，《民國日報》，1916年10月10日。
- ㊲ 寧垣慶祝雙十節情形，《申報》，1916年10月12日。
- ㊳ 嘉興三日中之國慶觀，《申報》，1916年10月14日。
- ㊴ 無妄：〈閒評一〉，《大公報》，1916年10月10日。
- ㊵ 心森：〈閒評二〉，《大公報》，1916年10月10日。
- ㊶ 慶賀中之責望，《大公報》，1918年10月10日。
- ㊷ 雷行：〈何謂國慶〉，《大公報》，1920年10月10日。
- ㊸ 今日之國慶點綴，《大公報》，1922年10月10日；〈關於雙十節所聞一束〉，《大公報》，1922年10月10日。
- ㊹ 然犀：〈弔國慶〉，《大公報》，1922年10月10日。
- ㊺ 懷遠國慶日學界之舉動，《大公報》，1923年10月13日。
- ㊻ 參見陳恆明：《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頁29。
- ㊼ 繆子：〈我所經過之一打雙十節〉，《申報》，1924年10月10日。
- ㊽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七月至十月）》（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頁326。